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刊 (34)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No. 34

清末留日學生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DURING THE LATE CH'ING

黃福慶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4）

清末留日學生

黃 福 慶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清末留日學生 / 黃福慶著. -- 三版. -- 臺北市 :

中研院近史所, 2010.12

面; 公分.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34)

ISBN 978-986-02-5177-7 (平裝)

1. 清末留學運動 2. 日本

529.282

9902114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34)

清末留日學生

著 者 / 黃福慶

出 版 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 行 者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30 號

電話: (02)2782-4166

劃撥帳號 / 1034172-5

戶 名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 購 處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印 刷 /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 716 號 8 樓

電話: (02) 8227-8766

初 版 / 中華民國 64 年 7 月

再 版 / 中華民國 72 年 6 月

三 版 /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定 價 / 新台幣 250 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02-5177-7 GPN 1009903557

本書撰寫期間，獲美國福特基金會（The Ford Foundation）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之資助，書成後，復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出版經費，特此一併致謝。

三版序

本書於 1975 年出版以後，承蒙學術界先進的鼓勵與指正，對我日後從事學術研究，有極大的鼓舞作用。

撰寫本書的當時，由於研究資料尚未完全開放，資料蒐集受到很大的限制；加上我的學術研究才剛起步，對於問題的思考很不成熟，因此，僅能憑藉蒐集所得的有限資料，進行歸納整理，草草撰寫成書。本書出版後，雖然獲得學術界的肯定，回想起來，本書之撰寫仍有不少疏漏之處，自己總認為是一本很不成熟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目前研究資料已大量開放，自己的思考能力也已漸趨成熟，如果要我重新撰寫同個一題目，相信對問題的看法與撰寫方式，將會異於往昔。

我認為這本書只是開拓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本書出版後，看到年輕學者在這個領域上，不斷地發掘新的問題，作深入探討，並發表成果，甚感欣慰。然而，不論是清末或民國以來的留日學生，還有很多值得開發的研究議題，相信未來還會出現更多豐碩的成果。

本書三版之問世，凡出版之籌劃、版面之設定(直排改為橫排)、內文之校對，乃至原始資料之核對等費神費時之事宜，勞煩本所同事張力教授、任育德博士，與蔣緒慧、蕭家圓、許蕎蓁三位小姐協助，備極辛苦。本書之所以能以嶄新的面貌呈現給讀者，應歸功於張力教授。我內心真不知道要說什麼感謝他的話，我只能說除了感謝還是感謝。本所慨允本書三版重印，謹此一併致謝。

黃福慶 2010 年 12 月 1 日於台北市南港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自序

自十九世紀以來，中西文化發生了嚴重的衝突，由於西方世界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相形之下，我們是落伍的。因此，所面臨的最根本問題，便是如何近代化？近代化推動的先決條件，在於求取人材。以先進國家而言，人材盡可在本國培養，但清朝由於新式學堂的設立與新式教育的實施較晚，以致人材的培養，不得不仰賴於外國。清末所以極力獎勵學生出洋留學，原因即在此。再者，每當國際戰爭慘遭敗北之後，國內的反應是如何變法圖強，這種變法改革的提倡，與其說是出於主動，不如說是迫於不得已。清廷派遣學生留學，亦可說是在這種被動的改革情形下而付諸實施的。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內憂外患，交相煎迫，國運危在旦夕，尤其甲午一役，更是創巨痛深，受到種種不平等條約的束縛。當時清廷雖倖免於滅亡，但是將近半世紀的次殖民地體制，卻於此時形成。

然在危難之中，也出現了一線曙光，那就是維新運動以及因政治改革而需求人材的培養。變法運動雖然歸於失敗，但是人材的培養，尤其是派遣學生出洋留學，卻未因變法失敗而停辦。這些人材，日後在中國的建設上，成為一股很大的推動力。

同治末年，中國即開始派遣學生出洋留學，當時的留學國家，幾一致為歐美各國，直至 1896 年以後，始有留日學生的派遣，這顯然是受了甲午戰爭刺激的結果。蓋當時為政者與知識階層，鑒於日本維新有成，咸以從日本間接學習西洋的近代化最為簡便，因而大力鼓吹留學日本。無可否認，在客觀的條件上，留學日本，實較留學歐美，有不少方便之處。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留學日本之所以成

爲一股熱潮，並不是偶然的。

留學日本，原係應一時之急，難免有許多不盡理想之處；如學習程度參差不齊，距留學理想甚遠；但是，他們在日本期間頗爲活躍，其生活亦多采多姿，曾引起中日間各階層的注目與關切，尤其他們在近代中國政治與思想上的貢獻，絕不因日後內外情勢的轉變而磨滅。

自 1896 年至 1937 年，這將近半世紀的期間內，如將留學日本的歷史，依據留日學生集體返國的舉動加以分析，則可分成四個時期。第一期：自 1896 年至 1911 年；第二期：自 1912 年至 1915 年；第三期：自 1916 年至 1931 年；第四期：自 1932 年至 1937 年。第一期返國的動機，係由於國內情勢所致。第二至第四期，皆係由於日本之侵略爲主因。本書的研究範圍，係屬於第一期，這一階段的留日學生，最受重視，而且對日後的影響也最大，

本書共分六章，一、時代背景，二、留學日本的發軔，三、學生的特質與政策的配合，四、學習生活與環境，五、文化活動，六、政治活動。皆以研討他們在日本的一切活動爲主。至於他們在近代中國歷史地位上的評價，由於範圍廣泛，問題複雜，此處無法詳述，擬於另文中，再作深入的探索，本書僅在有關處，略誌數語。

本書定題之初，蒙業師郭量宇先生多方指導，衷心銘感。撰寫期間，承王樹槐、張朋園兩先生提供不少寶貴意見；1968 至 1971 年，在福特基金會資助赴日進修期間，復獲東京大學榎一雄、田中正俊、佐伯有一、坂野正高諸教授之指導，東洋文庫以及東京都立日比谷圖書館特殊資料室惠借資料，並給予種種方便；章節之安排，文字之潤飾，承趙中孚及陶英惠兩兄諸多費神，謹在此一併誌謝。

目 次

三版序	iii
自 序	v
第一章 時代背景	1
第二章 留學日本的發軔	9
第一節 政策的確立	9
第二節 設置留日學生監督處	13
第三節 派遣武備學生	23
第四節 女子留學的濫觴	39
第三章 學生的特質與政策的配合	47
第一節 留學畢業生的考驗與獎勵	47
第二節 留學日本的限制	59
第三節 特約五校協議	68
第四章 學習生活與環境	77
第一節 認識與感受	77
第二節 日本人士的態度	83
第三節 教育環境——特殊學堂	87
一、專為中國留學生而設者	88
二、附設於某校者	100
第五章 文化活動	105
第一節 國內對翻譯日文書籍的提倡	105

第二節 譯書活動·····	114
第三節 出版刊物與清廷的查禁·····	131
第六章 政治活動 ·····	145
第一節 早期在政治意識上的感受·····	145
一、新思潮的沖激·····	145
二、維新思想的灌輸·····	147
三、革命意識的萌芽·····	153
第二節 早期的組織與活動·····	155
第三節 同盟會成立後留日學界的趨勢·····	162
一、與同盟會的關係·····	162
二、新思潮的興起·····	169
三、保皇思想的分裂與轉變·····	176
第四節 抵制強權運動·····	179
一、拒俄事件·····	179
(一)「拒俄學生軍」的組成及其活動·····	179
(二) 國內各界的反應 ·····	187
(三) 清廷的態度 ·····	190
二、「取締規則」風潮 ·····	193
(一)「取締規則」的頒佈及其原因·····	194
(二) 留日學界的爭議 ·····	202
(三) 罷課與歸國 ·····	207
第七章 結論 ·····	219
參考書目 ·····	225
索 引 ·····	233

第一章 時代背景

1896 年，中國學生始正式赴日留學。雖然在時間上，較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學（1872）晚了二十幾年，但在人數上，卻是後來居上。尤其在 1905 年至 1906 年之間，留日學生竟創下 8 千人以上的紀錄。這種空前的盛況，實含有深長的意義。導致這個盛況的原因，固然是由於各省大憲的鼓勵，與日本有路近、費省、同文同種之便，而內在的社會背景促使學生熱中於留學的心理，亦不能忽視。

向以天朝大國自居的中國，在甲午之役，竟為蕞爾三島的日本所擊敗，「睡獅」因被喚醒，舉國上下，咸受莫大的刺激，以為守舊不變，終非長計，乃積極追求所以維新之道，皇帝提倡於上，識者鼓吹於下，振興之象，遍於全國。甲午之役，使近代中國在發展上，進入一新的紀元；此後，所有的動向，皆起了劃時代的變化——無論在文化思想的受容與攝取，或推翻清廷的政治運動，莫不由於受了這種刺激直接或間接促成的結果。

清廷經此衝擊，對日本的態度，遂由鄙視逐漸轉為崇拜，更羨慕其維新的成就，以後的興革，莫不以日本為準繩，而尤以明治維新為藍本。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分析日本所以強盛的原因稱：「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伊藤（博文）、山縣（有朋）、榎本（武揚）、陸奧（宗光）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為西洋所脅，率其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為

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①強調興革與人材的關係，尤注重人材的培養。

在百事待舉，全國上下高唱改革聲中，人材的培養實為當務之急。各省大憲與知識分子提及國是，無不力主人材的培養，尤其主張派遣學生前往日本留學。^②因為日本除在客觀的條件上有利於留學外，內在的政治因素，亦為原因之一，因為日本的君主立憲體制，最能滿足清廷的心理需要。^③

清廷雖然極力主張攝取西學，但是又惟恐過分攝取西學而影響其政體本身的安危，因清廷以尊君愛國為國策，其希望留學的環境，不但有益於西學的學習，而且又能保持其一貫的體制。歐美固然是西學的發源地，但是其政情畢竟與中國有異。而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採取君主立憲，其政體與中國士大夫階級所標榜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相吻合。^④駐日公使楊樞就曾以這個觀念，作如下的剖析：

中國與日本地屬同洲，政體民情最為相近。若議變法之大綱，似宜仿倣日本。蓋法美等國，皆以共和民主為政體，中國斷不能仿倣；而日本立國之基，實遵守夫中國先聖之道，因見列強逼處，非變法無以自存，於是壹意立憲，以尊君權而固民志。

① 張之洞，《勸學篇》外篇，遊學第二（湖北書院，1898），頁5。

②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卷51，頁33-34，〈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請議遊學日本章程片，光緒24年4月13日〉。《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2月23日），〈國聞短評〉，頁75。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頁58、頁147、頁153。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學務綱要（湖北學務處，1903），頁4-5。

③ 石錦，《中國現代化運動與清末留日學生》（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8），頁7。

④ 石錦，《中國現代化運動與清末留日學生》，頁7-8。

考其立憲政體，雖取法於英德等國，然於中國先聖之道，仍遵守而弗墜，是以國本不搖，有利無弊。蓋日本所變者治法而非常經，與聖訓正相符合，即中國輿論亦以日本之變法參酌得宜，最可仿倣。^⑤

署理陝西學政劉廷琛赴日考察學務，在奏疏中發抒其觀感亦稱：

凡修身立行，忠君愛國之道，皆編入教科書，童而習之，用能人知自愛，國鮮衅民。近年尤重德育，大小各校，皆首重人倫道德。文部省所講述亦謂教育不原於道德，猶樹木有枝葉而無本根。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接見彼都士夫，或諄諄以為言謂其國歐化盛時不免弊害，賴以道德救之。其推崇我孔孟甚至，斯其進步之良者也。至規制，尤嚴整有法，教員非試驗不許濫充，無請託之弊；學生必約束納於規矩，無驕縱之風。日人性習勤儉，服食刻苦……政術與時變遷，必廣求知能於世界，斯理萬世不易，必當奉聖道為依歸。蓋風教略殊，凡綱常名教之大經，我自有立國之道，而規模燦著，彼設備訓練之陳迹，實足為前事之師。^⑥

日本當時的政情與教育，由上舉之例，可知一斑。在中國士大夫階級高談「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與重視聖道、人倫道德的背景下，^⑦

⑤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68，頁 34，〈出使日本大臣楊樞請仿倣日本設法政速成科學摺，光緒 30 年 12 月 14 日〉。

⑥ 《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70，頁 11，〈署理陝西提學使劉廷琛奏陳調查日本學務情形片，光緒 32 年 12 月 8 日〉。

⑦ 《清季外交史料》（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卷 147，〈劉坤一張之洞奏條陳變通政治四端懇決意施行摺〉。端方，《端忠敏公奏稿》卷 3（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

明治維新的一切措施，最能迎合中國朝野的心理。基於這種政治的主觀因素而主張留學日本，是很自然的現象。

留學日本，其客觀的條件，固然與當時一般人觀念中的同文同種有關，但是費省實為促成一致主張留學日本的最大因素。中國與日本，僅一海之隔，來去方便，以當時中國內地交通不便，咸以從上海去日本，無異於去蘇州，去杭州，或者去通州。^⑧當時中國學生至日本，約分為南北二大道：南省各地學生均以上海為出發地，北省各地學生則以芝罘為出發地。從上海動身者，可買船票至橫濱，再換乘火車至東京。從芝罘動身者，可買船票至神戶，由神戶換乘火車至東京。旅費大致如下：

數目 起訖地	車船 等次	頭等	二等	三等	備註
芝罘→神戶		65	45	18	船票
上海→橫濱		54	33	12	船票
上海→神戶		42	26	10	船票
神戶→東京		12	7	4	火車票
橫濱→東京		0.96	0.56	0.32	火車票

註：(1)右表係根據章宗祥，《日本遊學指南》，頁 28 而作。

(2)數目以日圓為單位（當時每 1 兩銀約合日幣 1.4 圓）。

由上表可知，自芝罘或上海至東京，縱然乘坐頭等車船，所費僅六、七十圓之譜，所需行程總計六、七日可達（由上海至長崎二日，

頁 63-64。

⑧《蘇報》，光緒 29 年 3 月 28 日，〈論說——與友人論遊學書〉。

又二日至神戶，又二日至橫濱），^⑨較之前往美國僅旅費就需銀三、四百兩，^⑩航程月餘，無論在金錢與時間上，均經濟不少。

至於在日本的起居飲食，最廉者每年約日銀二百五十圓至三百圓，^⑪自費前往，負擔亦不至太重，較留學西洋每名歲需一千五百兩左右，^⑫差距甚大。張之洞除在〈勸學篇〉中列舉留學日本之利外，在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摺中，對於留學日本，客觀因素的方便稱：

而教法尤以日本為最善，文字較近，課程較速；其盼望學生成就之心至為懇切，傳習易，經費省，回華速，較之學於歐洲各國者，其經費可省三分之二；其學成及往返日期可速一倍。^⑬

章宗祥為早期的留日學生，在他所著《日本遊學指南》一書中，一再強調日本路近費省，而且科目齊全，鼓勵國內青年前往留學。他說：

以言路程，則遠者十日，近者五日可達。以言費用，則多者三百金，少者百餘金已足。以言學校，則政農工商武備技藝等，無一不備。故欲遊學外國，為吾國求未聞之學問，其便益當無有出於日本之右者矣。^⑭

⑨ 《蘇報》，光緒 29 年 4 月 23 日，〈在日本東京紹興人寄呈同鄉公函〉。

⑩ 1872 年選派幼童赴美留學章程中規定，來回川資及衣物等件，每名銀 790 兩，見《約章成案匯覽》（上海，1905），乙篇，卷 31 上，游學門，頁 6，〈選派幼童赴美肄業辦理章程〉。

⑪ 《東方雜誌》第 2 年第 2 期（光緒 31 年 2 月 25 日），教育（上海，1904），頁 156。《新民叢報》（橫濱，1902）第 46 至 48 號合本，〈學界時評〉，頁 5。章宗祥，《日本遊學指南》（1901 年），頁 23-27。

⑫ 《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63），卷 43（奏議 43），頁 11-12。

⑬ 《張文襄公全集》卷 52（奏議 52），頁 27。

⑭ 于寶軒編，《皇朝蓄艾文編》（上海：上海官書局，1902），卷 16，學校 3，頁 33。

前往國外留學，不論是官費或自費，經費應為先決條件。留學日本，在經費方面既然較諸西洋為省，以官派而言，可多派，培養更多的人材，亦為自備資斧者所嚮往。在這種背景下，熱中於日本留學，是很自然的趨勢。

再者，日本官紳在華的活動，亦為促成留學日本熱潮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自甲午戰爭以後，朝野上下湧起一股研究中國的熱潮，紛紛設立研究會或其他團體，以研究或調查中國實情。他們在表面上，美其名為親善提攜，保全東洋，實則包藏禍心。^⑮甲午戰役，日本從中國得到不少權益，兩國之間難免發生隔閡，日本為示好於中國，最佳的途徑之一便是從教育方面著手。而中國方敗，正崇拜明治維新的成就之際，日本官紳紛紛來華，遊說地方當局派遣學生赴日留學，藉以培植新人材。^⑯他們欲以各種文化措施，促進中日兩國民族的接近，其中有以透過語言宗教等謀真誠的交接者，亦有以教育文化之交流以圖疏通者；其手段與方法，雖然不一，然其表現在安定東亞大局的地理的、民族的和平思想的努力，則出於一貫的共同的理想。^⑰總之，他們的口號，係「基於維持東亞經綸之大策」而發，^⑱實則另有盤算。

日人藉培養中國人材，以達其伸展勢力於大陸的目的，可從日本的輿論與一些人士的言論上得到旁證。例如：《教育時論》第 599 號

^⑮ 日本在華的活動，參閱石錦，《甲午戰後日本在華的活動》（《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 2 輯第 4 冊，頁 227-232）。

^⑯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對支回顧錄》（東京：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1936），下卷，頁 275。《清季外交史料》，卷 128，頁 22。《張文襄公全集》卷 79（電奏 7），頁 19-20。丁鴻臣，《東瀛閱操日記》（1900 年）卷上，頁 13。

^⑰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對支回顧錄》上卷，頁 686-687。

^⑱ 橫山健堂，《嘉納先生傳》（東京：講道館，1941），頁 159。

中，即提到「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為教育上之主動者，為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定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¹⁹

1898年5月14日，當時的駐華公使矢野文雄致外務大臣西德二郎的函件中亦強調：「如果將在日本受感化的中國新材散佈於古老帝國，是為日後樹立日本勢力於東亞大陸的最佳策略；其習武備者，日後不僅將仿倣日本兵制，軍用器材等亦必仰賴日本，清國之軍事，將成為日本化。又因培養理科學生之結果，因其職務上之關係，定將與日本發生密切關係，此係擴張日本工商業於中國的階梯。至於專攻法政等學生，定以日本為楷模，為中國將來改革的準則。果真如此，不僅中國官民信賴日本之情，將較往昔增加二十倍，且可無限量地擴張勢力於大陸。」²⁰ 矢野的函件，赤裸裸地道出日本的政略陰謀。

日本人士願教育中國人材，不能說毫無誠意，但誠意卻為其政略陰謀所掩蓋，致使中外輿論發出日本所以「心營目注，專以教育為當務之急，建設學校也，推薦教員也，美其名曰扶植中國之文明，切其辭曰實行博愛之主義，吾國民方感其雅意之殷拳，而不察其陰謀之眈逐，合朝野上下以心醉而歡迎」之言論，²¹ 以警戒國人。外人亦評稱：「中國效法日本，至善之事：莫如振興教育，既派學生前往日本入大學校及教授專門之學校肄業，又派專官詳察教育事宜，北京直隸各學堂，均延有日本名人為之教授新學，湖廣、四川兩總督亦禮延日本

¹⁹ 《新民叢報》第3號（1902年2月23日），〈國聞短評〉，頁76。

²⁰ 河村一夫，〈駐清公使時代の矢野龍溪氏〉，《成城文藝》46，頁68-69。

²¹ 《外交報彙編》（臺北：廣文書局，1964），第2冊，頁350，〈申論外人謀握我教育權之可畏〉。

人士襄助學務，是中國教育之權，日後必爲日本所占矣。」²²

日本意在培養一批親日人士，而中國之對日本，亦欲「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各有各的目的，所以儘管日本銳意以教育爲扶植其勢力之源，但是清廷朝野卻沒有太顧慮其野心。日本既處在這種主觀與客觀的有利條件下，故留學日本的浪潮於焉展開。

²² 《外交報彙編》，第3冊，頁220，〈論中國與日本之關係〉。